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輯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一輯

科學出版社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輯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一輯

侯仁之主編

顧頡剛 譚其驤 任美鏐 編著
侯仁之 黃盛璋

科學出版社

1959

內 容 簡 介

本書共選擇：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徐霞客遊記四種名著。這四種書都是我國古代十分重要而且具有代表意義的地理著作，對於要瞭解我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的人，都應該加以涉獵和閱讀。選注包括三點：(1)對所選名著的基本內容、作者和它在地理學上的價值作了扼要的介紹，使讀者能對全書有一個概括的瞭解；(2)對所選擇的名著（一段或數段）進行必要的注釋，特別着重在地理內容的闡發上，盡量減少讀者在閱讀上的困難；(3)利用地圖可彌補文字說明的不足，使讀者有圖和文相對照，閱讀時更容易理解。本書可供地理工作者及高等學校地理系、歷史系師生參考閱讀。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一輯

編著者	顧頡剛 譚其驤 侯仁之 黃盛璋 任美鏘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001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9年9月第一版	書號：1917 字數：180,000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京) 0001—3,020	印數：9,000；3

定價：1.20元

序 言

這部書的編纂，原是想供給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有興趣的地理工作者和大學地理系的學生參考閱讀的。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歷史悠久，古代地理名著，代有其作。只是由於古書的閱讀比較困難，青年讀者，每多望而却步。因此想到，最好是在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名著中，選出必不可少的若干種，先進行選注的工作，以便初學者的閱讀。選注的要求有以下三點：（1）在選注一書之前，應對全書及其作者作簡單的介紹，並指出該書的基本內容及其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先使讀者對全書有一個概括的瞭解。（2）從原書中選錄一段或數段，進行注釋，重要的還不在於文辭，而是對於其地理內容的解說和闡發。（3）除去文字注釋之外，還要利用地圖以補文字說明的不足。如果這三點可以作到，實際上也就等於對古代地理學的一部分遺產，進行了一些初步整理的工作，這就是三年前計劃編纂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時的一種想法。

這一想法，後來經過一些同志們的討論，認為可行，而且應當立即進行；同時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領導同志認為這一工作對於一般地理工作者也是需要的。因此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這時就決定以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和徐霞客遊記四種作為選注的嘗試，並約請了顧頡剛、譚其驤、黃盛璋、任美鏗諸位先生分担進行。這樣就可以較快地把嘗試工作完成。如果這一工作確實合乎客觀的要求，那就可以選擇更多的書，約請更多的人，各就所專，集體進行，這樣就可以很快地把我國若干古代地理名著，作一次選注和評價的工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初步的嘗試工作，幾經遷延，一直到今天才算告一段落。

為什麼要選擇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和徐霞客遊記這四種書作為選注的嘗試呢？這有以下三方面的考慮：（1）這四種書都是我國古代十分重要的地理著作，凡是想瞭解我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的，都應該加以涉獵和閱讀。（2）對一切初學者來說，前三者都是不容易閱讀的，一定要經過注釋，才好理解。最後一種，雖然是一部遊記，文字也不難懂，但是它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卻有待於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和術語去加以注解和詮釋。（3）這四種書，按其成書時間來說，最早的禹貢和最晚的徐霞客遊記相去約二千年，在這二千年之間，這四種書的每一種都在我國地理學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簡單說來：禹貢是我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一部地理著作，在其成書年代上，比起我國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經中的山經——是較晚的，但從地理學的價值來說，却在山經之上。如果山經的作者是按方向和道里來進行地理知識的羅列和記載的，而禹貢的作者則已經掌握了區域研究的方法，並對每區地理情況，作了十分簡潔扼要的描述。所以山經的份量很大，而禹貢的全文卻不滿一千二百字。用不足一千二百字來分別概括了九個區域的地

理情况,以及九個區域之間的山川分佈的大勢,這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禹貢的作者還通過了這部地理著作,來強有力地宣傳了大一統的思想,這一思想就其時代來說,是具有先進意義的。禹貢的作者不是為地理而研究地理,他是把地理研究作為他的政治宣傳的手段的。換句話說,禹貢是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的一部地理著作。漢書地理志又與禹貢不同,它是在我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一部全國性的地理著作,它以行政區劃為綱來敘述全國疆域、政區、人口、物產、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和地方風俗等等,首創了一種便於仿效的地理書籍的寫作體例,這一體例及其相適應的內容,是符合一個封建大帝國的統治者的要求的,因此這一寫作形式在此後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至於水經注,又代表了我國古代綜合性地理著作的另一種形式,在寫作體例上,既不同於禹貢,也不同於漢書地理志。它是獨創一格的地理著作,以全國水道為綱,詳細地記述了全國各地的地理情况,其內容十分豐富多采,這為後世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貴的資料,這樣的著作,毫無疑問是只有在很多地方性的地理記述發達之後才會產生的。它可以看作是我國六世紀以前地理研究的一個結集。這一著作的完成,也反映了作者對於自己祖國的熱愛。最後是徐霞客遊記,這部遊記和一般所謂遊記確乎不同。它反映了作者在系統地觀察和描述自然地理諸現象時所表現的超越前人的一種新傾向,特別是他對於西南廣大地區內喀斯特地貌的考察,說明了他不但是在忠實地描述自然,而且已經在步步走向規律性的探討。從這一點來說,這部遊記可以看作是全世界最早的有關喀斯特地貌研究的寶貴文獻。作者生於明朝末葉,正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在當時的知識界中,已經開闢了崇尚實學、探討自然的新風氣,霞客的遊記正好是這一時代精神在地理學上的反映。一直到霞客的時期,我們可以說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都是站在世界最前列的,只是到了這個時期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在了我國的前面,我們才開始落後了。不但地理學如此,其他自然科學亦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才達到了科學的系統的和全面的發展”。¹⁾但是到了社會主義興起之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資本主義時代所達到的自然科學發展的水平又被遠遠拋在後面了。目前我國的自然科學隨着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步步勝利,也正在迅速地擺脫了過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落後狀態,向着世界的最前列邁進。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忽視對於祖國古代科學遺產的研究和整理。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²⁾這裏所作的,或許可以算是研究和整理我國古代地理學遺產的一個小小的嘗試。

最後應該說明,各書除去禹貢外,這裏所選注的都是極少的一部分,只能作為研究和瞭解全書的一些例子來看待,而且所選的也不一定恰當。至於禹貢,原文雖然有限,却是頗費理解,句句都需要解說,所以就全部注釋了。但是由於舊日把它尊為經典,歷代研究

1) “自然辯證法”導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4—20頁。

2) 毛澤東選集:新民主主義論,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9頁。

它的人也很多，有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現在不能把這些前人的意見完全拋開不論，因此在注釋中也常常有引證或總結前人諸說而加以論斷的地方，結果注釋的分量就大大增加了。這對初學的人看起來可能感到有些困難，但是對一般地理工作者來說，似乎還是需要的。

各書由於性質不同，所以注釋的方式也不一致。注文和所附地圖的不妥之處，是難免的，對於原著的介紹，也只能代表注釋者個人的意見。好在這只是一個嘗試，懇請讀者多提意見，多予批評，如果這一作法對初學者以及一般地理工作者還有一些幫助，那就再考慮繼續編下去，並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分担這項任務。

最初動議編纂這本選讀，是三年以前的事，那時還不敢設想在短期間會有中國地理學史這類書籍編寫出來。但是就在去年祖國各項事業大躍進中，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和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幾位同志，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發揮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居然在短期間，把一部中國地理學簡史的初稿寫出來了，目前正在修訂。這冊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正好可以看作是中國地理學簡史的補充讀物。

在這書的編纂過程中，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曹婉如同志在原稿校閱上曾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地理研究所鈕仲勳同志和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王北辰同志也都熱情幫助，在這裏應該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侯仁之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日

目 次

序言	i
禹貢(全文注釋)	1
漢書地理志(選釋)	55
京兆尹	57
河南郡	63
濟陰郡	70
勃海郡	75
越巂郡	82
敦煌郡	91
水經注(選釋)	96
灤 水	99
鮑邱水	105
渭 水	110
徐霞客遊記(選釋)	122
江源考	127
遊黃山後記	129
麻葉洞遊記	130
滇遊日記四	132
粵西遊記三	132
桂林七星岩遊記	132

禹 貢

顧 頡 剛 注 釋

中國現存的古代史書，最古的算是尚書，而禹貢是尚書裏重要的一篇，向來列於虞夏書中，見得它是虞、夏時代的著作，有人甚至說爲大禹的親筆，大家以爲它離開現在已經四千多年了。

禹貢，是中國古代最富於科學性的地理記載，它是以徵實爲目的而用了分區的方法來說明各區的地理情況的。它的分區的標準，是因於名山大川的自然界畫。這似乎和山經有些相像，因爲它倆都是打破了原有大邦、小邦的疆界而用統一的眼光把當時可以走到的地方作成一個總的分劃的；只是山經用的是“五方”，禹貢用的是“九州”，有些不同而已。

在禹貢裏，每州只舉出兩三個名山大川作爲分界點，不像後世地方志的列出“四至、八到”，所以不容易畫出精密的地圖，確定九州的疆界。大概說來，當時的黃河從今山西省的西境（西河），經河南省的北部（南河），沿着太行山轉到河北省的東北境（東河），周匝三面，好像一個口袋似的，那時人稱呼這塊地方爲“兩河之間”，這個區域喚做冀州。從冀州的東河一直往南到濟水（這條河的下游已爲黃河所奪，即今山東濟南市迤北至渤海的一段黃河河道），包有河南省的東北角、河北省的南部、山東省的西部，這個區域喚做兗州（濟水的上游叫洸水，“兗”是“洸”的字誤）。從兗州往東南，現在稱爲山東半島的，喚做青州。青州南面，從泰山起，南到淮水，現在是魯南、蘇北、皖北地方，喚做徐州。從淮水以南直到東海，跨今蘇、皖兩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東部、河南和湖北兩省的東邊一角，喚做揚州。揚州以西，包有江、漢、洞庭湖等流域，北起今湖北南漳縣西的荆山，南到湖南衡山之南，即今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部分和江西省的西部，喚做荊州。從荆山而北直到黃河，即今河南省的大部分和湖北省的北部，喚做豫州。從今陝西、甘肅兩省的秦嶺以南包括全部四川省，喚做梁州。從秦嶺而北，東邊到黃河，西邊約到今甘肅省的西境，喚做雍州。這是禹貢九州的具體分劃。在這九州的區域中，作者記述了那裏山、川的治理經過，以及土壤如何，草木如何，礦產如何，中央政府所規定的田畝和賦稅的等級如何，有哪些特產和手工業品，有哪些少數民族的特產，運輸這些農產物、特產和手工業品進貢到中央的路線如何，都用了簡潔明瞭的文字寫出來，說是禹在平治水土之後所作。尚書已是“聖人”（孔子）編定的書，禹貢又是“聖人”（禹）作的，因此歷代的讀者就把它捧到絕對尊嚴的地位。

禹的治水，本是古代一個極盛行的傳說，在這傳說裏，極富於神話的成分，例如說上帝怎樣發怒降下洪水，禹怎樣在茫茫的洪水之中鋪起土地，禹怎麼變成動物來治水，禹和各

處水神如何鬥爭獲得勝利等等。這些傳說雜見於詩經、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但禹貢的作者則刪去其神話性的成分，專就人類所可能做到的平治水土的方面來講。這位作者暗示着洪水的來源是由於山洪暴發和河道不修，平治水土應該從山和川兩方面下手，因此，他在敘述九州之後便說到“導山”和“導水”，指出了把主要的山岳和主要的河流修好是治水的最重大的任務。

最後，作者又記下了一個“五服”的制度，這是把王都作為中心而向四方擴展的。他說：在王都四面各五百里（即方五百里），這塊地方叫做“甸服”；那裏的人民應把農產品送到王都裏去，爲了遠處運輸困難，所以規定近處送的多，不但送穀子，連稻稈也要送去作牛馬的飼料，遠處送的少，只須把打出的精朮送去就是。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這塊地方叫做“侯服”，這是帝王分封給諸侯的領土，近處封的是小國，遠處封的是大國。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綏服”，這是介於中原和外族間的地區，應當給它安撫和羈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裏推廣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頓武備來保護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綏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要服”，要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荒服”，這些地方都是外族所居，同時也是中國流放罪人所在。照這般說來，那時的天下（甸、侯、綏、要、荒）共計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勢力所及的地方（甸、侯、綏）所謂“中國”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屬於中央的王畿（甸）則只有方一千里。

這個五服之說，我們一看就知道它只是假想的紙上文章，世界上哪有這樣方方正正的區划！而且這個區划跟界線不規則的九州說比較，就顯出了很大的衝突。照九州說來講，作者所設想的王都在冀州，所以各州的貢道都直接間接地達到黃河，然而冀州在九州裏却是處於北部的一個州，和五服說把王都放在中心的絕對不同。兩種說法畫成了地圖套不上去，這就害得作解釋的經師們無法自圓其說。因此，書集傳的作者蔡沈只得老實地說道：“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到現在，我們可以更具體地說：五服說和九州說是兩種矛盾的地方制度，不該並容在一篇裏的；而且，這兩種說法不但在區划上有矛盾，在政治意義上也有矛盾，九州說是在君主集權制下產生的，五服說卻是在最高領主和大小封建領主佔有土地的制度之下產生的。說到這裏，就知道五服說的時代比較九州說爲早。

五服說不是一個假想的制度，是古代實際存在的，在國語的周語裏說：“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那時所謂“夷”、“蠻”、“戎”、“狄”諸少數民族都是和諸夏雜居的，而甸服裏也分封諸侯，所以這裏所謂“服”只是部份或類別的意思，不是分疆畫界的意思。當周朝得了天下之後，還有許多土著國家和商朝所封的國家存在，這種國家可以看作侯服的衛星國，周王也用了賓客之禮來對待他們的領主，所以稱爲“侯衛賓服”。可見周王的剝削是不放鬆的，列在甸服的要每天獻祭物，侯服要每月獻祭物，賓服要在每一季度裏獻享物，這些所謂祭、祀、享的禮品，無非借了祖宗的名義來對農

奴和封建領主施行掠奪而已。至於要服的“夷”、“蠻”，只須每年來進貢一次，荒服的“戎”、“狄”更只須每一世裏來朝見一次，像逸周書王會篇似的用了“萬國來朝”的盛儀來壯壯當時帝王的場面，剝削的意義並不重。禹貢的作者只把“賓服”改為“綏服”，其他的名詞都沒動；可是他却把各服的里數確定了下來，反而成為一種幻想的制度了。

反過來看，九州制固然根據實際的地形而分割的，每州的土壤、物產等也都是科學性的記載，決不出於幻想，可是古代並不會真有這個制度。夏、商兩代都偏在中國的東部（湯滅夏後，夏族西遷，所以西北有許多以夏為名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即黃河中游和濟水流域；直到周族起於西方，才擴大了西邊的部分。可是周朝的王畿還只限於渭水下游和黃河中游；那汾水、濟水、汝水、漢水等流域是周王分封諸侯的地方而不是他直接統治的地方；至於比較遠一點的黃河下游和江南一帶，連宗主權的名義也不普及或不存在了。直至春秋、戰國之世，齊國儘向東面開拓，晉、趙、燕諸國齊向北面開拓，秦國向西面開拓，楚國向南面、向東西開拓，於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廣，中原人民移徙到邊區的就遠，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國”湧現。孟子上說：“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方千里者九”即是方三千里，也即是九百萬方里。這個幅員是九州的幅員，也是甸、侯、綏三服的幅員。所以在這一件事實上，可以知道九州說和五服分內外兩部分說，必然要到了戰國的中期才有出現的可能。這便是存在決定思惟的一個例子。因為九州說是在戰國的情勢下產生的，所以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北方為幽州，燕也。”它並不託古而把這種設想的背景直揭出來，這就使得禹貢的著作時代明晃晃地顯現在人們的面前。（這裏的幽州是禹貢所沒有的，因為那時九州說出現不久，還沒有到凝固的時代，所以會有幾種異說。）可是九州的規模雖然具備了，州名也已經叫開來了，却沒有得到政治家的採用。當秦始皇滅了六國，囊括宇內，只立了三十六郡，沒有想在郡上加州。漢初也沒有分州。到漢武帝時，尊重經學，才彙合禹貢和戰方的記載再加上自己的決定而分為十三州，然而州只是監察區，實際上還是由郡守來行政。漢武以後，制度漸變，州刺史改為州牧，才成了一州的行政長官。到了東漢末年，曹操執政，才依了禹貢而實定九州的制度。我們看了上面這些事情，可以說：五服制是在西周時代實行過的，到戰國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戰國時開始醞釀的，到漢末而實現。又可以說：五服制似假而實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實假，由假而化真。禹貢篇裏把落後的制度和先進的理想一齊記下，雖然顯出了矛盾，可是也就在這裏自己說明了著作時代。

說禹貢為戰國時書就靠在這一點上嗎？不，還有許多別的證據，現在舉出幾條。第一，在導山章裏，既有“內方”，又有“外方”，這內和外是怎麼分別的呢？原來春秋時候楚國都鄧，在今湖北江陵縣北，他們把在今河南葉縣南的方城山作為北方的屏蔽，在這山上築有長城，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外方山即今河南登封縣的嵩山，是方城之外的一座大山；內方山即今湖北鍾祥縣的章山，是方城之內的一座大山。可見這所謂內、外完全是由楚國人就防地的距離遠近和節節設防的需要而定出的名詞。至於西周時代，楚是受封於

河南西南部丹、沂二水之間的，不可能定出這些名詞來。第二，荷澤是在今山東定陶縣的一個湖，公元前 483 年，吳王夫差要和晉國爭霸權，爲了便利舟運，在宋、魯兩國之間開出一條運河，北頭連着沂水，西邊接着濟水，因爲經過荷澤，稱爲荷水。這條運河是把泗水（泗的下游與沂通流）和濟水溝通了的，而禹貢徐州章說到貢道，是：“浮於淮、泗達於荷”，意思是說由泗轉到荷，由荷轉到濟，由濟再轉到河。（這個“荷”字，今本已改作“河”，改字的人不知道“浮於淮、泗”是不能直接到河的。幸而說文所引的禹貢還沒有改。）從這個破綻裏，可以知道禹貢的著作後於夫差開河的時代已很久，那時人們早忘記了它是人工河而不是天然河了。第三“揚”和“越”不但是雙聲，而且意義也相同（見爾雅），所以揚州就是越地，和荊州就是楚地（見上所引呂氏春秋），都是把國名當作州名的。徐、揚兩州把淮水作爲分界線，徐州地方在春秋時，北部是魯，南部是徐和楚；揚州地方，北部還是徐和楚，南部是吳，吳的南面才是越。公元前 512 年吳滅徐，吳的北境才達到淮；到 473 年越滅吳，越境也就達到淮。可是禹貢說：“淮、海惟揚州”，不知道在前六世紀的後期和前五世紀的初期，越離淮還遠着呢！第四，春秋時中原諸國和西南方民族是沒有什麼往來的，楚國亦僅和巴國有些外交，而且那時的巴還沒有遷到今四川東部。至於蜀國，雖立國已久，但因山嶺重疊險峻，和外面是隔絕的；直到戰國初年，它才和秦國交通；到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滅蜀，那地開始成爲秦的郡縣，秦民大量移到那裏，那裏的實際情況才爲外面所知道。禹貢裏的梁州正是蜀境，顯然是秦滅蜀後所得的地理知識。第五，中國之由銅器時代進於鐵器時代，始於春秋而盛於戰國，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禹貢的梁州貢物有鐵和鏤，鏤是剛金，即鋼，這更不是虞、夏時代所可有，那個時代還是石器與陶器並用的呢！從這些地方看來，禹貢既不是虞、夏時書，也不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秦滅蜀以前的書，因此有人說禹貢中的大一統的思想這般濃重，該是秦始皇統一後的作品，伏生爲秦博士所以就傳了下來。

對於這一說，我們也不贊成。當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完成統一之後，就在東南方廢了東越諸王，立了閩中郡；在南方，他又略定了揚越和西甌駱，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北方，他派蒙恬擊胡，把河套以南的地方完全收了過來，置九原郡。這些新開闢的疆土，禹貢裏全未說及。不但始皇所拓新地沒有記載，當公元前 300 年，趙武靈王攘地西至雲中、九原，稍後燕國又開闢了上谷到遼東五郡，禹貢中也全沒有這些迹象。可見這篇文字的著作時代雖然不太早，也不會太遲。在禹貢裏，東南方只到震澤（即今太湖），南方只到衡山，北方只到恆山，可見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於公元前 280 年以前七國所達到的疆域。我們可以猜測，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較秦始皇統一的時代約早六十年。據舊說，禹治河始於公元前 2283 年，我們雖已把禹貢拉下了兩千年，但還是一部很早的有實際價值的地理書，是我國地理學中的寶典。這位作者利用了禹平水土的古傳說，給以新的生命，從此以後，人們就公認禹是一位水利工程專家而不再是神話中的神靈了。

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因爲他對於陝西、甘肅、四川間地理最明白，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因此，陝西的雍水、河南的澗水、灃水雖都是三四等的河

流，他都記得清楚；到了東邊，他就迷糊了。最顯著的錯誤，是長江的下游。他在導水章裏講：漢水自入長江以後，又從彭蠡（今鄱陽湖）出來，“東爲北江，入於海”，而長江呢，和漢水一起流到彭蠡之後，又同漢水分家，“東爲中江，入於海”，漢和江平行入海，這真是一個千古奇聞！而且漢爲北江，江爲中江，那必然還有一條南江，這南江是現在的什麼水道呢？從前學者因爲經書作於“聖人”，認爲絕對地正確，所以想盡方法作解釋，而沒有一個說法站得住，就因爲它脫離了實際的緣故。現在知道，禹貢的作者是西北人，他的地理知識自有其局限性，他那時決不可能對於東南地理弄清楚，以致出了這般的岔子。其它地方，像導山章，在今河南的桐柏山和湖北的大別山本相連貫，他卻分置在兩列；四川的岷山和湖南的衡山毫不相干，他卻合在一條線上，這也是他不明白東南地理的一個證據。

如果問：爲什麼山經和禹貢的作者都可能是秦國人，難道別國就沒有地理學家和地理書了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回答：秦國的文化在七國裏不算最高，像齊、楚、魏諸國必然還有比它更豐富的典籍，可是在秦滅六國之後來了一個大規模的摧殘，這些東西就一齊煙銷火滅了。史記六國年表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至於秦國自己的圖書，當然還好好地保存着；等到劉邦入關，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而傳尚書的伏生又是秦博士，所以這些書就倖而留傳了下來。

如果還問，禹貢作者既是西北人，他對於西北地理就完全清楚了嗎？對這問題，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地肯定下來。禹貢的著作時代正是山海經風行的時代，禹貢作者敢於突破了山海經的神秘觀念，一切從現實出發，這當然是他的科學精神的表現。但西北地方處處是高山峻嶺，交通十分不便，少數民族又習於自給自足，其統治者不和諸夏的統治者相往來，甚且相互視爲仇敵，就是有志探險的人也進不去，因此禹貢作者仍不免從山海經中取材。山海經的作者（這書是經過多少年的集體創作，不能看做某一個人所著）設想：西方有一座最高大的山，名爲崑崙，那裏是許多大川的發源地，大川的名字是河水、赤水、泂水（漢水的上游）、黑水、弱水、青水、白水，這些水除了河水之外都從北往南，流入南海。禹貢作者不信真是這樣，然而他又不能到那裏去實地視察，所以他在導水章裏說“導河積石”，又說“嶓冢導漾（即泂水）”，不說這些大川都發源於崑崙；赤水、青水、白水更一字不提，似乎他已不信有這些水。獨獨對於弱水，和黑水是承認了的，但他說弱水“餘波入於流沙”就不見了，和淮南子地形篇所說的“絕流沙南至南海”不同（地形篇完全承襲山海經，所以我們可以說它保存了山海經的佚文）。至於黑水，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他竟完全接受了山海經的說法。他既在梁州章裏說“華陽、黑水惟梁州”，又在雍州章裏說“黑水、西河惟雍州”，見得這一條大川是雍、梁二州分界的標幟；又在導水章裏說“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決定這條水是由西北流至西南而入南海的。試問從西北到西南，有祁連、西傾、積石、巴顏喀喇諸大山聳峙，重重疊疊地擋着，有哪一條水可以由北向南流着？但我們只須把山海經來比較，就解決了這問題。海內西經說：“黑水出（崑崙）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海內經說：“南海之南，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焉”，就是禹貢作者的根據。這位作者雖

是西北人，可是那時河西走廊和新疆、青海一帶都是氐、羌、月氏諸族所居地，他走不到，所以雖有澄清神話的志願，終究弄錯了！

到了今天，經書的權威已經打破，我們才可以指出禹貢篇的缺點。然而它的優點，我們必當承認。在兩千多年以前，交通不發達，巫風盛行，禹貢作者能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用微實的態度聯繫實際，作出全面性的地理記述，雖是假借了禹事作起訖，其實與禹無關，這是作者的科學精神的強烈表現，此其一。河出崑崙在那時已成定說，而他敘導河不說到積石以上；崑崙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也已取得那時人的公認，而他在導山章裏不說到西傾以上，雍州章裏雖說到崑崙，只是和析支、渠搜並列的一個西方國家；當公元前 335 年左右楚威王滅越，東南方的事物必然間接流傳到秦國，可是他只說到彭蠡、衡山而止，這都是他老實承認不知道，不肯輕信傳說的闕疑態度，此其二。他對於山、川、土壤都有系統的敘述，使讀者們對於域內地理有一個整體的看法，和概括明瞭的印象，此其三。掃除原有的國界痕跡，用自然界的山川作分州的界線，作大一統的前驅；又規劃了全國的交通網，希望加強統一的力量；又對於全國的田賦和貢物作出比較合理的規定，此其四。因為有這些優點，所以這篇文章，無論從政治上和從學術上看，都有它的一定的地位。

我們古代的地理學書——山海經開了幻想的一派，後來衍化為穆天子傳、淮南子地形、神異經、十洲記、博物志等書，而極於西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鏡花緣等演義；因為人們的實際知識繼長增高，所以這些東西只供閒暇談笑的資料。禹貢篇開了微實的一派，後來班固作漢書地理志、酈道元作水經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許多地理專著，沒有不把禹貢作為主要的引伸和發展的對象，人們都用了嚴肅和尊敬的態度對待它，因此禹貢的地位越高，山海經的地位就越低落。

解釋禹貢的書很多，為着時代不同，思想有異，分為漢學和宋學兩派。漢學注重師傳，容易墨守成說；宋學注重批評，敢於自出新解，但在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科沒有發達的時候，也容易流於武斷。就尚書學略舉數種，代表漢學的有唐朝孔穎達的尚書正義，清朝王鳴盛的尚書後案，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先謙的尚書孔傳參正；代表宋學的有宋朝林之奇的尚書全解，蔡沈的書集傳，黃倫的尚書精義，清康熙朝欽定的書經傳說彙纂。其專釋禹貢的有宋朝毛晃的禹貢指南、程大昌的禹貢論和禹貢山川地理圖，明朝茅瑞徵的禹貢匯疏、清朝胡渭的禹貢錐指、徐文靖的禹貢會箋、楊守敬的禹貢本義。其中以胡渭用力最深，他的禹貢錐指可以說是一部具有總結性的書。不過現在離胡渭的時代已經二百多年了，在這一段時間裏，地理學正式成為一門科學，我們應當對於禹貢再來一個總結，肯定它的正確地方，否定它的不正確的地方，給它一個適當的評價。

* * *

禹敷土⁽¹⁾，隨山刊木⁽²⁾，奠高山、大川⁽³⁾。

【注釋】(1) 敷，作分字講，又作布字講。禹敷土，是說當上古洪水橫流以後，不辨區域，禹乃為之分別區劃以為九州。

〔2〕 隨山，就是循行諸山。刊木，一解作斫木，謂禹治水時斫木通道，斫下的木材也可以作治水的工具；又一解是作為表幟，是說某山某水須要治理，就插一木以為標記。

〔3〕 奠作定字解。奠高山、大川，有兩種說法：一是尚書呂刑說“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就是山川的名稱都是禹治理洪水以後所取名的。二是鄭樵通志說“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就是禹既分別天下為九州，並且指定出名山、大川為各州的疆界。如像兗州以濟水、黃河為界；青州以海和泰山為界；雍州以黑水、西河為界；荊州以荊山、衡山為界；徐州以海及泰山、淮水為界；豫州以荊山及黃河為界；梁州以華山、黑水為界。我們知道，山川名稱的來源是經過許多年，許多史實造成的，決不是某一個人主觀的意見。這兩種說法不同，應該是後一種解釋比較合理。

冀州^{〔1〕}：既載壺口^{〔2〕}，治梁及岐^{〔3〕}。

【注釋】〔1〕 冀是春秋時國名，後為晉所滅，今山西河津縣東北有冀亭，即古冀國。冀州的名稱因古冀國而來。禹貢冀州的疆界，本文裏沒有說明，根據與冀州相連的雍、梁、豫、兗、青等州看來，它的境界是西、南、東三面距河，古黃河自今河南焦作市不東北流而東流，經修武、輝縣、滑縣、濬縣折北流，入河北境，又東北流至天津入渤海。河西為冀州的東界，河東為兗州的西界，據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河水注，這是禹河的古道，周定王五年河徙後，故道已堙廢了。北界不甚明確，冀州的範圍，大致有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遼寧西部。

〔2〕 既載壺口，既作已字解。是說壺口一段的河道已經治理完畢。載字朱熹說是“已事之詞”。壺口，據漢書地理志說“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漢北屈縣，在今山西吉縣西北。壺口山在今吉縣西北，陝西宜川縣東北，南距龍門約七十公里。黃河至壺口山，河身由二百多公尺收束至二十多公尺，懸崖直瀉，成為瀑布，上下水面高低相差到十五公尺，水勢奔放，頃注石槽，潏洄旋轉，好像壺形，故山名壺口。

〔3〕 梁是梁山，岐是岐山。陝西有梁山，在韓城、洽陽縣界，為黃河西岸的大山。陝西有岐山，在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一名箭括嶺，古名天柱山。這梁、岐兩山都在雍州的境內，自漢班固漢書地理志說梁在左馮翊，岐在右扶風，鄭玄從之，以為雍州山見於冀州，是治水從下起，故於冀州言岐、梁。宋蔡沈、曾岐等都主張梁、岐是冀州山，蔡沈尚書集傳說：“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呂梁山，在黃河東岸，為黃河與汾河的分水嶺。狐岐山，據清一統志說是在山西孝義縣西，一名薛顏山。一主雍州山，一主冀州山，這樣就成為歷代注說禹貢爭論的焦點。清崔述唐虞考信錄也主張梁、岐兩山在冀州，不過他修正了蔡沈的說法，認為詩經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的梁山，即是冀州梁山，水經河水注謂之龍門，在古韓國地，屬河東，自後人以陝西韓城縣誤指為古韓國，梁山遂在

河西，與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不合。他說：“岐無可考，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岐、梁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兗也”。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記說：“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崖際鑿跡，遺功尚存”。今雖不能明確指出梁山所在，至少是與龍門連麓的，所以酈道元把龍門指為禹疏河的梁山。壺口、梁、岐，都是因治河所施工而言，應當是黃河所經的山，若呂梁、狐岐都距河很遠，雍州的梁山非春秋晉地，岐山又在渭水流域，和導河無關，崔述的說法是比較合理的。

既修太原^[1]，至於岳陽^[2]。

【注釋】〔1〕 修作治字解。太原，孔安國說：“高平曰原”。舊說太原即古的平原，即今山西太原盆地。太原本是通名，後以為郡名，秦、漢有太原郡，即今山西太原市。胡渭說：“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清平陽府即今山西臨汾縣，平陽東北的太原，亦指今太原市。這是根據歷來相承的說法，以為太原是汾水所出，岳陽是汾水所經，“既修太原，至於岳陽”，是導汾水，所以太原即今太原市。今按史稱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傳至子燹父始徙居晉，後來都以太原說晉。晉地所在，其實不在太原。應劭漢書地理志臨晉縣下注說：“以臨晉水，故名”。又臣瓚注說：“晉水在河東”，是漢河東郡本有晉水。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說：“晉陽故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虞鄉，漢河東郡解縣地，是河東又有晉陽。水經涑水注說：“涑水又西南逕張揚城，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為二，城西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晉興澤，在今山西永濟東虞鄉鎮西南。涑水或者就是古晉水的別名，所以其地有晉興澤，又有晉陽城，那麼叔虞所封，晉之所興，當即在此。左傳昭公元年子產說：“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喜之，封之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從這段史料看來，臺駘為汾、洮之神，而處太原，太原當在河東，不是秦、漢的太原郡，所以王國維觀堂集林周莽京考申明子產的說法，謂：“太原正漢河東郡地，與禹貢太原在壺口、梁、岐、岳陽間者，地望正合。大澤當即安邑鹽池，或蒲坂張揚池”。根據這些，我們可以說古太原實在河東，兼帶汾、洮，南障大澤，相當於今山西聞喜縣一帶。聞喜當涑水之陽，若涑水果然是古晉水，聞喜也就是晉陽了。唐叔虞所封即或不必要就是聞喜縣，以晉興澤推考之，也應當如括地志所指的晉陽城，在今永濟縣虞鄉鎮西。永濟以上，汾水兩岸當中條山、霍山、

呂梁山脈間，也是廣大的平原，故可稱為太原。這是說把壺口山、岐山、梁山一帶的黃河治理好了，下流河東永濟到霍山一帶的平原就沒有水患，人民可以利用河水及汾水的灌溉耕種了。從前的人不明白晉陽所在，乃以太原市說之，又牽涉到治汾水上去，就使人迷惑難解，前後次序也雜亂了。

(2) 岳是太岳，即今山西霍縣東三十里的霍山，山南曰陽，今山西安澤、洪趙、浮山、翼城、曲沃、絳縣、垣曲、沁水、陽城一帶直到黃河北岸，包括中條山在內，都是岳山以南的範圍。和永濟的太原，正連接成一大平原。

覃懷底績^[1]，至於衡漳^[2]。

【注釋】(1) 覃懷，地名，舊說在今河南武陟、沁陽、溫縣一帶。史記夏本紀作“覃懷致功”，“致功”就是“底績”的解釋。覃懷當太行山南，黃河北岸，平夷廣衍，水流甚多，這一地的水利也是很重要的。

(2) 衡與橫同，漳即漳水，漳水在覃懷北，其水東流，故稱橫漳。古漳水上流合清漳河、濁漳河二水，東流注於河。覃懷和漳水下流都是平原，河道修整以後，水勢平復，漳水得東流入河，平原已無水患，這一帶地方都成了良田。以上是冀州境內黃河治理的情況，主要是使水不泛濫，平原地區又有水利得以耕種。

厥土惟白壤^[1]，賦上上錯^[2]，田中中^[3]。

【注釋】(1) 厥作其字講，史記夏本紀直接寫作“其”字。舊說白壤是白色無塊柔輦的土壤。

(2) 賦，是人民向國家繳納的稅，鄭玄及孔安國皆主穀米，蔡沈說是“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蓋以周代制度軍旅之征亦稱為賦的原故。上上是第一等。錯是錯雜，就是在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間的意思。

(3) 中中，是第五等。九州因地分上中下三級，而每級又分上中下共為九等，冀州的田地九州中屬於第五。田地的等級分類有兩種說法，一是從田地的肥瘠來說，始自王肅，胡渭等人多從之，以為山西地勢高寒，農產最薄；河北地勢低下，向多水災，故自古農田不及東南。一是從自然地形的高卑來說，始自鄭玄，江聲、魏源等人從之，說九州在昆侖東南，水皆東流，西北高而東南低，所以雍州在西北，其田上上，揚州在東南，其田下下，是以高為上，低為下。土壤既是上上，為什麼田賦的等級又在第五呢？蔡沈說是“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稠也”，這是調和之說。

恆、衛既從^[1]；大陸既作^[2]。

【注釋】(1) 恆、衛是兩水名，從來有二說，一是漢書地理志說：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滹。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庫池。又漢志說：“代郡靈邱，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鹵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恆、衛及滹水、庫

池四水，皆各有源流，不相通假。二是水經澧水注說：“澧水東過上曲陽北，恆水自西來注之，自下澧水兼納恆川之通稱，此卽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滹沱水注已迭，酈道元既以恆入澧得相通稱，那麼滹沱受衛之後，也可通稱衛水。王鳴盛尚書後案、成蓉鏡禹貢班義述等均主第一說。胡渭禹貢錐指根據水經注，證明河北曲陽以下的澧水（今唐河）卽恆水，靈壽以下的滹沱卽衛水。如這裏說的“恆、衛既從”，是九河既導以後，恆、衛兩水從河以入海，那麼水經注合流通稱的說法還講得過去，所以齊召南尚書注疏考證、徐文靖禹貢會箋、錢坫地理志斟注皆從水經注。今衛河古稱白溝，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合淇、漳諸水，東北至天津合白河入海，此爲隋煬帝所開，以發源地爲春秋衛國，故名衛河，唐、宋以來亦名永濟渠，非禹貢衛水。

（2）大陸，澤名，在今河北任縣東北，與鉅鹿、隆堯二縣接界，古有廣阿、鉅鹿、泰陸、大麓、沃川等名稱，又呼爲張家泊。舊時澤地甚廣，跨有今河北東鹿、隆堯、寧晉諸縣，後世淤斷，遂分爲二，一般叫寧晉泊爲北泊，大陸爲南泊，今皆淤成平地。據爾雅，廣平的地方叫陸，大陸是說有很大的一片平原，大陸地平近河，河水已治，水患既除，河北平原可以耕種了。

鳥夷皮服^{〔1〕}。

【注釋】〔1〕 史記夏本紀作“鳥夷皮服”。尚書釋文引馬融注：“鳥夷，國”。尚書疏引鄭玄注說“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可見在漢朝時，禹貢本作“鳥夷”，後來因爲僞孔安國傳說“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此後遂改作“鳥夷”，胡渭並以今日本、朝鮮等地指說之，姚明輝禹貢注又指今千島羣島卽禹貢的鳥夷，皆遠遠超出了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以外，不可信。當時的所謂“鳥夷”是泛指東方邊遠的一種民族，以狩獵爲主，衣皮食肉，還不知道耕種。皮服，就是那種民族沒有進化到利用絲、麻，還以鳥獸的毛皮作衣服。

夾右碣石入於河^{〔1〕}。

【注釋】〔1〕 碣石，山名，所在傳說不一，漢書地理志說：“右北平驪戎，大碣石山在西南”。胡渭禹貢錐指遂說：“今河北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大城，疑卽漢驪戎縣城。”樂亭西南高上堡，在渤海邊上，與僞孔安國“碣石海畔山”的說法相合，不過漢驪戎縣究竟是不是在今樂亭縣西南，還是問題。後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魏王泰括地志、鄭樵通典、杜佑通考等說碣石在盧龍，有的地圖也把碣石畫在河北盧龍、撫寧縣的東南，但是盧龍縣並沒有名碣石的山。漢書武帝本紀“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注說：“在遼西橐縣”，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從之，漢橐縣故城在今河北昌黎縣南。又明一統志說碣石在昌黎縣西北五十里，今名書院山；永平府志說碣石在昌黎縣北十里，今名仙人台；與文穎都說在昌黎，但方向不同，所指各異。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太康地理志說“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在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後漢書郡國志常